



革命回忆录丛书

2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征 途

革命回忆录丛书

第 二 集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十月·贵阳

责任编辑 周 珍 元
封面设计 石 俊 生

征 途 (第 二 集)

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125印张 194千字

印数 1—5,500

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1115·39 定价: 0.63 元

目 录

回忆安顺地下党早期的斗争·····	谢速航 (1)
光照千秋·····	丁 毅 (14)
——忆黄大陆烈士	
怀念亲密战友李策烈士·····	丁 毅 (27)
平凡而光辉的一生·····	严金萱 (41)
——怀念我的五哥严金甦	
从贵州到延安·····	周晓山口述 罗绍书整理 (51)
由滇入黔开辟新区的斗争 ·····	段一芳口述 马文骏整理 (66)
忆恽代英同志·····	王志之 (82)
贺英逼上云岭寨 ·····	熊月姑口述 彭名正、常怀新整理 (92)
土城战斗前后·····	邓寅章口述 徐文仲整理 (109)
贺龙率红三军到黔东·····	<u>陈正国</u> 口述 王庆澜整理 (127)
在艰苦的年代里·····	傅纪昌口述 王奇辉整理 (144)
跟随朱总司令出太行·····	李树槐口述 李志宽整理 (156)
回顾南泥湾·····	文炳清口述 邱宗功整理 (172)
五花营战斗·····	郭省吾口述 马文骏整理 (186)
湖西贾庄地道战·····	张世珠 (193)
强攻石家庄突破战·····	贺 明 (213)
血战三黄庄·····	高生贵口述 刘 灿整理 (222)
一支二十响手枪·····	朱秀帮口述 马文骏整理 (233)
进军贵州的日日夜夜·····	徐挹江 (245)
平凡而伟大的人·····	石金生 (252)
旧州保卫战·····	时连忠口述 杨 忠、刘必祥整理 (262)
夜摸敌师部·····	张德庆 (272)

回忆安顺地下党早期的斗争

谢 速 航

苦难的山城

二十年代的贵州正处于贫穷落后，交通闭塞，军阀混战，鸦片充斥，民不聊生的混乱状态。甲子年（公元一九二四年），贵州出现了空前大旱，河塘干涸，稻田龟裂。我的故乡安顺，也和贵州广大地区一样，久旱不雨，禾苗枯萎，颗粒无收，连城区吃水也要到离城几公里的马槽龙井去挑。真是哀鸿遍野，满目凄凉，饿殍载道。当时安顺县城每天死于大十字鼓楼脚下的饥民，就不下数十人。唯独县里的几家地主豪绅，却大量囤积粮食，投机取巧，大发横财，成天花天酒地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而广大劳动人民，却嗷嗷待哺，无法生存，真是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阶级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。因此，农民起义遍及各地，如安顺南部的陆云清（人称陆麻二），贞丰一带的王海平等率领农民，抗击官府，号称黔西“四大天王”。反动当局十分恐慌，他们为了镇压农民起义，与地方军阀勾结，采取围剿、欺骗等办法进行分化、镇压。他们用军阀名义邀请“四大天王”开联防会议，借机逮捕了这四个农民领袖，并在安顺、贵阳等处示

众后枪杀。记得在安顺东门的牛场坝、西郊马场坝、北郊的孤坟坡，一次就杀害了五百多个农民，有的枪毙，有的杀头，真是尸横遍野，白骨成堆。

飞 出 牢 笼

由于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出现，安顺城里有恒兴益、恒丰裕、公合长等几家大庄号，他们经营鸦片、洋货。大量洋货布匹从上海、汉口运来，冲击市场，迫使许多小手工业者织的土布卖不出去。于是，我父亲的染布手艺也没人问津了。全家生活成了问题，只好托人将我送到恒兴益庄号去当学徒工。常言道：“徒弟徒弟，三年奴隶。”我在恒兴益学徒期间，白天除了打杂、跑腿外，还要听老板娘使唤，侍候东家，从早到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当时我曾写了个顺口溜：“铜烟盘，重又大，每天早晚把它擦。铺板比那门板大，抬不动，奈何它，老板还要把气发，操他妈！”

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地劳动了三年，除了吃饭以外，毫无报酬。第四年满师应该拿工资了，老板又节外生枝地说：

“还须参师一年。”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干一年。可就在这一年，老板却百般刁难，甚至借故打骂，无事生非。记得有一次，他要我半夜出去扛东西，因为路远我回来迟了，他开口就乱骂，说我是吃白饭的。当时，我忍无可忍，回敬了他几句，老板大发雷霆，揪着我要动武，我趁势打了他一拳，这样我就被开除了。老板开除我的手法也很巧妙，在发生冲突的当天，把我叫去，一改他恶狠狠的面目，很客气地说：“老三！你现在象鱼长大了，我的池塘小了，容不下你了，你回家

去发财吧！”于是，我便被无条件开除回家了。父亲虽然埋怨我苦了四年，一无所获，但也同情我的遭遇，又惋惜，又埋怨，絮叨了半天。可父亲哪里知道，恒兴益招收徒工，主要是剥削劳动力，徒工白白为他干活，待到满师快拿工资时，便千方百计把你赶走，又重新招收一批童工，替他无偿的劳动。

由于家庭生活的困难，使我无法待在家里，便下决心离开故乡，到外面去找活干。于是，我离别了亲人，步行到贵阳去。

由贵阳到重庆

我有个姨妈住在贵阳白沙井，我决定去求她帮助，找个出路。到贵阳那天，街上人群拥挤，许多学生高喊着口号：

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反对卖国政府！”蜂拥前进。恒兴益在贵阳的分店由于贩卖日货，被愤怒的群众砸得稀烂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因为恒兴益贩运鸦片，贩卖日货，我是知道的。当人们高喊着“抵制日货！”“打倒军阀！”的口号时，我也跟着高喊，心情异常激动。

到了姨妈家，她对我的遭遇也深表同情，并告诉我，大表哥在重庆当电报局局长，要接她到重庆去，路上无人照料，要我陪她去，可能的话，通过表哥的关系帮我找个工作做。于是，我便欣然同意，决定随她去重庆。在贵阳住在姨妈家，每天上街看学生游行，包围伪省政府，要求惩罚奸商。这些进步思潮，使我在思想上受到一点启发。

过了几天，我便随姨妈动身去重庆。姨妈坐滑竿，我跟在后面步行。当时，川黔公路尚未修通，交通不便，从贵阳到重庆要走十八天，中途要翻越娄山关、凉风垭等大山。一

路虽十分辛苦，但沿途所见所闻，对我却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。那时，贵州的食盐从四川用苦力背来，路上看到背盐巴的脚夫，十分辛苦。他们为了生活，象骡马一样成群结队的背着沉重的盐巴，举步艰难，非常吃力的往山上爬，稍有迟缓，夫头便用鞭子抽打。夫头不叫休歇，就不敢休歇。所谓休歇，也只是用一个“丁”字形背杵支撑着背上的盐巴架子，站着稍歇片刻。他们身上穿的十分破烂，一个个累得汗流浹背，连揩汗的手巾都买不起。每人颈子上挂着一块竹片，用来刮汗水，天长日久，竹片被汗水浸成板栗色。闪闪发光，成为他们随身携带的宝贝。

路上走了十八天，终于到了重庆。表哥安排我在电报局保管文具纸张，并介绍一个老报务员教我学习翻译电码和收发电报。这位老报务员见我诚恳用心，接受能力快，也很喜欢我，热心帮助我。只可惜我对英文一窍不通，收发电报有些符号要用英文字母代替，不懂英语是学不好的，我又请他为我补习英文。老师的英文修养很好，加上我每天坐在保管室里有大量的时间，便成天读英语和练习打蜂鸣器（一种练习拍发电报的工具）。仅一年的时间，我便学完了开明英语读本第一、二册，地名拼音也能应付了。不料事与愿违，工作又成了问题。

一九三二年，交通部长王伯群被撤换了。旧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表哥的电报局长被撤换后，我也不能再在电报局待下去，由表哥资助我五十块钱，我背着行李，省吃节用，长途跋涉，回到了老家安顺。

离家一年，比四年学徒所见所闻丰富得多。在贵阳接触了热火朝天的反帝运动，在重庆又看到了工人、学生请命抗

日的洪流，看到许多共产党员高呼口号，被绑赴刑场英勇就义的悲壮场面。真是行千里路，胜读万卷书啊！

安顺地下党的诞生

我回到老家安顺不久，安顺邮局招聘检信生，许多青年都去报考。我因懂得英文拼音，能把许多英文地名译成中文，便被录取了。

邮局的检信生，比邮务佐低一等，主要是担任分发邮件、售邮票、收挂号信等，每月待遇六块银元。在安顺这样穷乡僻壤的小城市，已是人人羡慕的好差事了。

当了检信工人以后，每月所得工资，除一部分交家中作生活补助外，剩余的钱全部用来买书和订报纸杂志。白天工作，晚上坚持学习。

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，一些进步书刊和杂志也陆续传到安顺来。我对《文学月报》、《文学季刊》、《光明》、《慧星》等文艺刊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读了《小说月报》上刊登的鲁迅的短篇小说，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。以后，又读了鲁迅的《彷徨》、《呐喊》等小说，引起我对不合理的阶级社会的憎恨。此外，还读了茅盾的《春蚕》、巴金的《家》、蒋光慈的诗《纪念碑》等书。这些书为我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。这时，我也开始写“四年学徒生活”，准备向报刊投稿。当时，早年到北京、上海求学的青年，相继返回安顺，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，提倡新文化。在这些进步思潮的影响下，追求进步的青年越来越多。

一九三三年，我们十几个青年文艺爱好者，创办了一个

“晓鸡声文艺社”，出版《晓鸡声月刊》。这个刊物的宗旨：主要是提倡新文化，以文艺的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救亡。也写了一些反映社会时弊的文章，如我写“四年学徒生活”的文章，反映了我学徒期间受资本家剥削的情况。刊物的印刷费是由每个社员交会费支付的。《晓鸡声月刊》出版后，曾寄到各地交换。于是，我们收到大量的图书杂志（包括进步的 and 反动的），从而丰富了我们这个文艺社的学习内容，开阔了眼界。

当时，象这样的进步文化团体，在贵州各地都有出现，如毕节有“草原艺术研究社”，贵阳发行有《救国旬刊》，贵阳文学研究会出版有《贵阳文研》等。安顺除了《晓鸡声月刊》外，还有个进步学生组织“三一读书会”，是由李应亨领导的。安顺中学出的《安中校刊》是由傅以平、陈汉民等主编的。

《晓鸡声月刊》问世以后，引起贵阳文学研究会的注意，通过缪正元、周凤逸等的联系，建议把晓鸡声文艺社同贵阳文学研究会合并，晓鸡声文艺社改为“贵阳文学研究会安顺分会”，出版《文研生活》，交流书报，推荐作品。改组后，由我和邹凤逸、缪正元负责。不久，又与李应亨领导的“三一读书会”合并，同时接办了《安顺三日刊》，我任副刊“新芽”的编辑。加上傅以平、谢家鹏、陈汉民等主办的《安中校刊》，使安顺的进步文化生活十分活跃。因而，引起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重视。贵州省工委的林青、秦天真、刘茂隆同志先后到安顺来帮助工作，发展和建立了安顺党的地下组织。

一九三五年春，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，林青同志到遵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，经党中央批准成立党的地下组织贵州省工委。林青同志回来传达中央指示后，派秦天真同志来安

顺，住在顾府街龙树黔家里，找我们去谈问题和研究工作，并把晓鸡声文艺社和三一读书会的部分成员组织起来，办了个短期党训班。由秦天真同志给大家讲形势和革命道理，并在进步青年中成立了少共青年团(简称CY)，把部分先进分子发展为共产党员，成立了安顺县工委，由我任工委书记，龙树黔任组织委员，陈汉民任宣传委员。从此，安顺有了党的地下组织。

初试锋芒

红军长征路过贵州前，安顺一带驻扎的是地方军阀犹国材的部队。红军长征过贵州，国民党中央军尾追入黔，蒋介石趁机兼并军阀势力，从而统治贵州，并迫使犹国材部队改编为二十五军，犹任军长，辖两个师，即何知重的一〇三师，吴剑平的一二一师。

当时，这两个师均有地下党员打入内部，进行活动。我们通过一〇三师参谋长黄大陆的关系，派肖世铤到该师任参谋；缪正元、邹风逸两同志主持电台工作。在一二一师有共产党员丁沛生打入，任警卫连长。军阀部队被改编不久，一〇三师便调离安顺，黄大陆、肖世铤、缪正元同志也随军开走，只剩下一二一师驻扎在安顺。这时，蒋介石调他的嫡系李觉的一个军来安顺换防，企图迫使一二一师离开安顺。当时，在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同志的领导下，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，开展对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。当时研究决定：由丁沛生同志策动一二一师警卫连的两个排哗变起义，拖到郎岱、贞丰、盘县一带打游击。这支队伍编为中共黔西游击队

第七支队。参加这支队伍领导的共产党员丁沛生任支队长，王芸生任指导员。队伍拖出去后，沿途打土豪，缴伪乡公所枪支，很快发展为五百多人的队伍。后来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正确的战略战术的指导，在敌人重兵包围下，不是采取运动游击战术，而是坚守阵地，或攻坚打硬仗。因此，在国民党中央军和滇军的夹击下，整个支队在郎岱附近的山区被打散，牺牲了十几个同志，丁沛生同志在战斗中受伤，后来潜入郎岱隐蔽养伤，由我负责给他医治，伤愈后到陕北去了。李光庭、王芸生同志仍回安顺活动。

另外，我们还策动了一二一师和伪中央军火并。正当蒋介石的嫡系李觉部队准备强迫一二一师调离安顺时，安顺地下党工委研究，如果犹国材、吴剑平的部队调走，伪中央军驻防安顺，对我们党的活动是极为不利的。于是，决定策动一次两军火并的斗争。我们当时的作法是：一方面用安顺人民群众的名义，写信给一二一师全体官兵表示挽留；一方面大量印发传单，通过邮局分送全市机关、商店；在街上张贴标语、口号：“二十五军一二一师是安顺人民的子弟兵！”“不要离开可爱的故乡，去当蒋介石的炮灰！”“反对中央军奸淫良家妇女！”“少妇被强奸，乃翁遭毒打！”“李觉部队滚出安顺去！”我们连夜在街头贴出这些标语。

一二一师官兵接到信件、传单，看到街上贴的标语后，认为安顺人民拥护他们，自己有本钱，对中央军的骄横、盛气凌人，早已愤愤不平。李觉的中央军看到这些传单、标语后，误认为是一二一师官兵搞的，一面电告蒋介石，说一二一师反叛了；一面对一二一师官兵，随便枪杀。一二一师官兵忍无可忍，便开枪打死中央军的挑衅者。犹国材率领他的全

军从安顺府衙门拖出西水关，退到北校场营房。李觉部队在城内不断出击，被犹国材的教导团伏击，死伤一百多人。当时，安顺地下党的计划，是让蒋介石逼犹国材的部队拖上山去，然后再派人去做工作，动员这支部队起义。不料蒋介石却十分狡猾，听到两军火并后，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，怕引起更大的纷争，立即把李觉部队调走，仍派犹国材部驻扎安顺，并以金钱抚恤、赔偿损失等小恩小惠，拉拢地方军阀，从而平息了两军火并。这次火并虽然没有达到使犹国材部兵变起义的目的，但却迫使国民党中央军调离了安顺。一方面给地下党开展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，另一方面更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憎恨。关于这次火并的情况，我们曾向当时党在巴黎办的刊物《救国时报》和上海油印刊物《少共真理报》发了消息，均刊登在这两种刊物上。

地下交通站

地下党安顺县工委成立后，贵州省工委负责人林青、秦天真等同志到安顺来指导工作，当时党中央指示贵州地下党要“面向遵义，背靠云南”。于是，安顺便成为党的活动中心。

一九三五年，红军长征经过安顺附近的旧州、贞丰一带时，为配合红军长征，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亲自到驻在岩脚的一〇三师，通过打入一〇三师的参谋长黄大陆，弄到了国民党十二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国民党军事部署文件、“剿共”计划及密电码等，并派我到安顺西郊接应。

一天黄昏，我到安顺西郊等候。当时城门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，进入城门口的人都要周身搜查，据说有共产党

混入城内，敌人十分恐慌，对任何人都不放过。

在这紧急关头，只见秦天真同志穿着一件灰布长袍，大摇大摆的走过来。刚到城门口，只听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几个伪军将刺刀架在秦天真的胸前，恶狠狠地嚎叫：“干什么的？”秦天真同志从容镇静，泰然自若地回答：“教书的。”敌人又问：“身上带有枪吗？”天真同志摇了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“搜！”几个伪军边说边上前去强行解开秦天真同志的长袍纽扣，进行搜身。当伪军把天真同志挟在腋下的一个纸卷搜出来，厉声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秦天真同志笑着回答说：“糊窗子用的废纸。”那个伪军不耐烦地将纸卷往地下一扔，我急忙挤上前去叫了一声“哥”，秦急忙将纸卷拾起来递给我。趁他们搜他的身时，我混在人群中溜走了。秦却故意使敌人怀疑他身上有武器，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，让我远远离去。当敌人在他身上搜不出什么东西，才放他走了。当晚我们到预定的地点——顾府街龙树黔家里，秦天真同志才说：“今天的事真险啊！纸卷里都是密电码和军用地图。”当晚，便将这卷文件安全送到红军联络处。

林青、秦天真同志还指示我们，要我利用在邮局工作的有利条件，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。当时我们采用的办法是：

（一）自配密写药水：用中药五味子泡水澄清后，写在信纸背面，收信人再用青矾水涂染后，便显现出字来。此外，用米汤写字，收信人再用碘酒显现。（二）写假通讯地址：如某条街只有一二〇号门牌，信封上写一三〇号，敌人就是查出问题也无法找到收信人。（三）用英文或拉丁字母拼写通讯地址，让敌人误认为是外国人的信件，不敢检查，待分信时再取出来。

我们采用以上这些办法，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眼睛，顺利地通过了贵阳这道关卡。当时省工委向各地发出的信件，都通过邮局内部传递。后来，中共中央从陕北瓦窑堡寄来的红军大学的招生简章、外国寄来的文件、巴黎的《救国时报》、共产国际文件《季米特洛夫报告》、莫斯科寄来的各种小册子等，大都写东京湾转云南昆明，再转到安顺来，避开贵阳这条线。我们虽然采取了很多办法，但危险性还是很大的。林青同志告诉我们，地下交通线犹如刀山火海，危险异常。我们生活在敌人的刺刀底下，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革命工作虽艰巨，但是很光荣。

果然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前来检查邮件，这些特务是两个方面派来的，一是军统特务，以一二一师政训处的名义派到邮局来检查；另一批是中统CC特务，是以国民党安顺县党部的名义派来的。只要邮件一到，他们便蜂拥而来，争先恐后地把每封信件逐一拆开检查。开始时，被拆的信件还盖个检查图记，后来怕被检查者知道，只偷拆查看，不留任何痕迹。这些检查员有的老奸巨滑，有的却幼稚可笑，对一些男女间的恋爱通讯，兴趣浓厚。比如，水红色的信封，纤细的字迹，都是他们猎取的对象。我们为了挑起群众对邮检人员的不满，故意把一些经过邮检的信拆开，张冠李戴，笑话百出。待群众来邮局追问时，我们就说是检查人员弄错的。引起收信人的极大愤怒，大闹伪县党部，弄得敌人狼狈不堪。不久，国民党县党部又派来一个邮检特务，态度十分骄横，常常显示出他了解共产党活动的规律，查出某封信上有句可疑的话，便捕风捉影，大做文章。后来，党组织通知我，说此人是个叛徒，化名来安顺邮检，目的是寻找省工委

负责人疏散到安顺来的踪迹。得到通知后，我一面尽量使我们的邮件避开检查，一面设法把这个叛徒打击一下。于是，我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，让敌人内部互相矛盾，彼此猜疑。

我们了解到军统特务对国民党县党部派来的CC特务之间有矛盾，趁他们双方不在时，故意把一二一师政训处盖有绝密字样的信件拆开，重新封上，并有意露出检查过的痕迹。政训处的军统特务发现他们的绝密信被人拆开过，便气势汹汹地来问我们：“谁把我们的信拆了？”我们假装不知道，故意说：“县党部的那位检查官最后走的，没有别的人来过。”于是，那些军统特务便认为是那个叛徒搞的，当即去找到他，不由分说，便是一顿毒打，直打得那个叛徒鼻青脸肿，还不知究竟为什么挨的打。国民党安顺县党部怕同驻军的关系搞坏，再也不敢派那个叛徒来邮检了。

一九三五年“七·一九”事件发生，省工委在贵阳遭到敌人破坏，林青、刘茂隆和另一些同志被捕，林青同志在贵阳遭敌人杀害，慷慨就义；刘茂隆同志逃出虎口，敌人四出追捕。由于我们采取各种办法，巧妙对付敌人，使安顺这条地下交通线，安然无恙，继续它的正常工作。

团结进步力量，争取多数

党的地下工作，既要坚持隐蔽，又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来掩护我们的工作。《安顺三日报》是进步民主人士吴晓耕主办的，他是个旧文人，我们团结他，他把《安顺三日报》副刊这个园地交我们办；又如《晓鸡声月刊》经费困难，我们有意聘请民主人士韩文波为

顾问，由他资助一些印刷费。安顺圆通寺有个和尚方明，是佛学院的学生，经过我们对他的团结和启发，他放弃了神学观点，走上革命的道路，作了一些掩护工作。

由于我们注意团结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，抗日救亡运动在安顺开展得十分活跃。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间，各学校、商店、银行的青年中，都发展了民族解放先锋队，简称“民先”。民先安顺支部成立时，省工委也派人来参加，并在成立大会上印发了抗日救亡宣言，每星期到郊区开展爬山运动，实际是练习打游击，利用农民银行的电台，收听党的战报广播。由于以上多方面的开展活动，使当时安顺街头巷尾，墙壁桥头都写上标语：“抗战到底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反对妥协投降！”等口号，深入人心，抗日歌声响遍全市。

由于一二一师内部还有人同情我们的行动，因此敌人的动态随时都有人向我们透露，使我们党避免了一些损失。比如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油印刊物《烽火》杂志出版（系李应享、汪剑平、杨斌玉等主办的），上面有我写的题为《论农民领袖四大天王》的文章，敌人准备以此为借口，说我勾结土匪，要逮捕我。一二一师内部却向我透露消息，我即逃离安顺，避免了一次逮捕。

我在一九三八年冬天的一个早上，把安顺地下党的工作交给杨斌玉同志，便秘密离开安顺到镇远、贵阳活动。后来，又到重庆、昆明等地，屈指一算，距今已四十余年。以上是安顺地下党初期活动情况，过去苦难的山城，现在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以后发生的事，留待后来的同志续记吧！

一九八〇年五月于沙市